

水浒简评

南开大学中文系《水浒简评》编写组



水 浒 简 评

南开大学中文系《水浒简评》编写组



内部发行 第1版第1次印刷 第1次印刷 第1次印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北京

一、《水浒》是一部反面教材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古典小说。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时候“一百〇八将”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先是晁盖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奠定了梁山事业的基础，但作者对晁盖和他的正确路线采取排斥态度，“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摆在陪衬地位，写得很简略。以后，地主分子宋江混了进来，篡夺领导权，搞修正主义，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受了“招安”，投降了封建朝廷，然后去镇压由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终于葬送了梁山泊的农民革命事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美化投降派宋江，鼓吹投降主义路线，它的要害是投降。这部小说用地主阶级的反动观点歪曲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它的出笼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政治需要。《水浒》的作者为了美化投降派宋江，把这个人物着力涂抹了一番，但我们看来却是越描越黑，把宋江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都显露出来了。作者为了鼓吹投降主义路线，叙述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搞投降活动的全部过程，这样，宋江瓦解梁山起义队伍的阴谋手段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都显露出来了。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

看,《水浒》这部书,可以被我们用来作为一部反面教材,从中总结出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帮助我们在复杂的斗争中学会辨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歪曲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

《水浒》这部小说是以北宋末年为历史背景的,那时,我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期,阶级矛盾和国内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土地兼并的情况极为严重,全国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被享有封建特权的官僚地主所霸占,广大农民大多没有土地。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上台以后,设立“括田所”,用“皇室”名义霸占良田三百四十万亩。这个被《水浒》吹捧为“圣明天子”的宋徽宗,实际上是个极其昏庸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他穷奢极欲,巧取豪夺,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例如,他为了建造宫室、花园,派反动官僚朱勔(miǎn 免)去东南各地大量搜罗花、石、竹、木和珍奇物品,调集两千多只船往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运送,每十只船组成一“纲”,叫做“花石纲”。为了运送花石,往往掘开堤坝,拆毁桥梁、民房,造成严重的破坏。仅“花石纲”一项,就害得无数劳动人民倾家荡产。另外,当时我国北部的契丹族的辽政权、党项族的西夏政权的贵族统治者不断对中原地区进行侵扰,腐败的赵宋王朝对此采取的是忍辱退让的投降主义政策,每年都要向那些反动贵族缴纳很多银两和绢匹,这当然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更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

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卖儿卖女、饿死路旁的惨景比比皆是。“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当时的阶级对立就是这样尖锐，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地主身居高楼，饱食终日，悠闲自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农民的奋勇反抗，全国各地普遍燃起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主席在这段论述里提到的宋江和方腊，就是北宋末年在我国北方和南方分别领导农民起义的两个领袖。他们所领导的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即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距离现在已经八百五、六十年了。关于宋江起义的具体情况，历史书籍中有过片段的、零星的记载，说他带领起义队伍在山东、河北一带纵横驰骋，好几万朝廷官军都不敢跟他们交锋。至于宋江的结局，史书的说法不一致，有的说他兵败被擒，被封建王朝杀害了，也有的说兵败以后“江乃降”。究竟哪种记载准确，还有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去做必要的考证。

《水浒》这部小说，是文学创作，并不是历史记录。小说里

的宋江并不是历史上的宋江，而是作者按照地主阶级的反动观点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水浒》只是把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当作了一条引线，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是沿着这条引线生发开来，添枝加叶，虚构编排而成的。作者宣称：“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这就是说，《水浒》所描写的并不要求是真人真事，而是借宋江这个“话头”来宣扬“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我们今天评论《水浒》，是针对小说里所描写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而不是对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作考证研究。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部小说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反映出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真实面貌。所以，《水浒》只能是一部反面教材。

适应了地主阶级镇压农民 起义的反动政治需要

梁山泊故事最初来源于北宋末年北方地区发生的宋江起义。从梁山泊故事开始流传到《水浒》出笼，中间经过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元朝末年、明朝初年时候，即十四世纪六、七十年代，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地主阶级文人，适应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政治需要，对长期流传的梁山泊故事进行选择、摒弃和篡改，写成了《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明代刻印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有的题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所谓“的本”，就是用作依据的原本；有的题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据此，可能是先由施耐庵写成初稿，然后又经罗贯中整理编订而成书的。

有关施、罗的生平事迹，现存的资料很少，有的记载不见得可靠，几条材料也吻合不到一起，所以我们只能大体上指出他们两个人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元末明初。另外，罗贯中除了整理《水浒》之外，还写过《三国演义》等其他小说。

从南宋时代开始，梁山泊的故事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了。在绘画、戏曲、民间说书、文人诗歌等方面，现在也都还有一些资料可以查考。《水浒》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演变迹象，那就是，封建文人按照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把宋江逐渐描绘成了一个忠于皇帝的投降派，把整个故事逐渐编造成了一个完整的投降过程。我们举两个事例来看：

宋末元初时候，有个封建官僚兼画家叫龚开的，他沿袭前人的绘画传统，画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图象，并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绰号各写了四句“赞词”。那时，宋江已经有了“呼保义”的绰号。“呼保义”就是称作“保义”。“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是保护皇宫的“侍卫”中的一个不太高的职衔。对于忠心的奴才，象地主武装的头目之类，皇帝也往往赏给他们“保义郎”的称号。龚开给宋江写的赞词是：“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意思是说，宋江不触犯封建制度，不自立为王，而是尊重皇帝，以一个“保义郎”的身分自喻，不象狂妄的董卓那样，专搞些封建纲常所忌讳的事。这里，龚开特别强调了宋江的“不假称王”。宋江自己不称王，就是承认赵宋王朝的封建政权，不反皇帝，不打算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可以说，宋江这个投降派在龚开的笔下已经具有雏形了。

宋元之际，出现了一部《大宋宣和遗事》。这部书的前集

第四节写的就是“梁山泊聚义本末”，记述虽很粗略，但已初步具备了《水浒》故事的轮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有了受招安、征方腊的情节，把宋江搞投降活动的具体内容大致规定下来了。《大宋宣和遗事》是一本拼凑孔孟之道的杂伴儿，书中写的梁山泊故事，虽然采录了民间传说的一些材料，却是在孔孟之道的思想指导下经过选择和篡改的。

从《水浒》故事开始流传到施耐庵、罗贯中最后炮制成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地主阶级把他们的反动思想灌注进去，按照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把宋江涂抹成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人物，把梁山泊聚义的过程编造成了受招安、打方腊，最后终于被瓦解、被消灭的一个完整故事，从而使《水浒》起到了宣扬投降主义、瓦解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作用。

元末明初时候，施耐庵、罗贯中为什么要炮制《水浒》呢？这是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密切关系的。元朝末年，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农民大起义，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那些作威作福欺压农民的贵族大姓的地主分子，不是被起义军处死就是被起义军赶跑。《水浒》的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仇视农民起义，既看到封建统治者不能扑灭起义烈火，又看到当时农民革命队伍中曾经出现张士诚、方国珍等投降派，为了适应地主阶级瓦解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于是就炮制了《水浒》这部鼓吹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说。小说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地主阶级正是把《水浒》用作对付农民起义的反动思想武器的。

地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总的说来，不外两手，一

手是残酷的武装镇压，一手是阴险的政治欺骗。后一手就是诱降，就是招安。手段虽不相同，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封建统治者交替使用这两手，能镇压就镇压，镇压不了就招安，而且又往往是镇压的过程中兼施招安，招安的过程中兼搞镇压。他们也不隐瞒这一点，“镇”和“抚”，“招”和“讨”，一直是相提并论的。宋代设有“镇抚使”和“招讨使”的官职，就是公开宣称他们要用这两种手段去对付农民起义的。宋朝以后，我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封建制度已经腐败。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对待农民起义，更加注重软硬兼施。《水浒》写招安投降，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策略的。

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阴险狡猾的封建统治者还有更恶毒的阴谋。那就是招安一支起义军，使他们变成自己的鹰犬，再利用这支军队去镇压另一支起义军，也就是用“替天行道”的强盗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这才是地主阶级最合适的如意算盘。《宋史·侯蒙传》记载，老奸巨猾的地主阶级官僚侯蒙为扑灭宋江、方腊起义而向宋徽宗献策，大意是说：宋江在北方起义，官军镇压不了，方腊又在南方造反，形势更加危急，不如赦了宋江的罪，把他招降过来，让他去征讨方腊，立功自赎。侯蒙献策，深得皇帝的赞许。《水浒》赞扬宋江的接受招安，吹捧他镇压方腊的“功绩”，这不正是完全按照侯蒙的如意算盘描写的吗？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就是武装镇压和政治欺骗。《水浒》中的高

俅、童贯是刽子手的角色，宿元景、张叔夜是牧师的角色。宋江呢？先是混进梁山泊，念着“招安经”，瓦解了一支起义队伍，充当了宿元景之流的代理人，然后公然投降过去，充当鹰犬，挥舞屠刀，镇压方腊，又成为刽子手了。在瓦解梁山泊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宋江这个投降派起到了作为刽子手的高俅、童贯之流所没能起到的反革命作用。

《水浒》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从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六百年间，一直众说纷纭。地主阶级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人骂宋江是强盗，也有人称赞宋江的“忠义”；明清两朝曾多次明令禁毁，一些王侯大臣和官府衙门却又不断翻印。那些头脑简单而昏庸的封建文人没有领会到《水浒》作者的一番“苦心”，他们不了解投降派宋江在瓦解农民起义中的“妙用”，而另外一些封建文人却看到了这一点，能够领会施耐庵、罗贯中的恶毒意图。由于封建文人们对《水浒》的看法不一致，适应着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所以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删节、增补、续作、评点种种情况，反映了他们围绕这部小说的纷纷争吵。这样一来，《水浒》的版本也随着复杂起来了。

说到这儿，有必要把《水浒》的不同版本简单地介绍一下。

《水浒》的版本很多，现在流行的，经过重印的，主要有三种本子：

一是百回本。一般认为，百回本是比较接近施、罗原作的本子。现存完整的百回本是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容与堂本”，一九七五年影印出版过《明容与堂刻水浒传》，随即又标点出版，定名为《水浒传》。我们现在评论《水浒》，一般以这个本子为主要依据。

二是百二十回本。明代的封建文人和书商，以百回本为基础，加上征田虎、征王庆两个片段，接合而成了这种本子。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百二十回本，有杨定见写的一篇“小引”，故称“杨定见序本”。这个本子增添了田虎、王庆被镇压的故事，说明了编纂者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态度。解放初翻印过，题作《一百二十回的水浒》，新排本题作《水浒全传》。最近又重新排印了这个本子，仍名《水浒全传》。

三是七十回本。明末清初时的反动文人金圣叹把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都删去了。以百回本为基础而言，是砍掉了二十九回。他把原本的第一回改为“楔子”，以下的回序依次前提，又捏造了一个卢俊义做噩梦的结尾，便是七十回的《贯华堂古本水浒传》。解放后重印这个本子时，删去了结尾的“惊恶梦”等情节，“楔子”重新作为第一回，成为七十一回本。被金圣叹“腰斩”成的七十回本，是流行最广的一种版本，但它不完整。鲁迅非常不满意被金圣叹砍过的《水浒》，把它比作“断尾巴蜻蜓”。所以七十回本不能作为我们评论《水浒》的依据。

很清楚，地主阶级对《水浒》的不同意见，不过是泄露了他们在如何消灭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各自主张采取不同的手段罢了。他们的分歧与争吵，丝毫也抬高不了《水浒》的身价。

反面教材大有用处

《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是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古往今来，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无不进行

了充分的表演。《水浒》的作者精心塑造了投降派宋江这个典型人物。因为作者的立场、观点是地主阶级的一套，所以在他们看来，宋江是个忠于皇帝的地主阶级的理想人物，要歌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科学分析，跟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宋江是个混进农民革命队伍、出卖农民革命的反面人物，要批判。地主阶级的走狗与农民革命的蛀虫原是一回事，地主阶级对他是歌颂，而无产阶级对他是批判。这就是根本的分歧。

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地主阶级分子是怎样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他又怎样用阴谋手段篡夺农民革命的领导权的？特别是他怎样搞修正主义，怎样用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原来的农民起义路线？要了解这些，请读《水浒》，请看投降派宋江。梁山泊的农民起义是怎样失败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怎样推行的？投降以后，宋江又干了哪些恶罪勾当？要了解这些，也请读《水浒》，它描写了宋江搞投降活动的全部过程，对这些方面也作了具体的描述。如此完整的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确乎是不可多得的。

我们要把《水浒》当作反面教材来读。反面教材，大有用处。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员的作用，曾经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是反面教员，通过评论《水浒》，我们能够增强识别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指出的“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对古

代投降派宋江的剖析，把古今投降派进行比较和对照，可以进一步认识现代投降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反动嘴脸。凡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要当投降派，充当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林彪之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我们评论《水浒》，就是要从这部反面教材中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投降主义一露头，就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遵照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我们认清了《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这部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故事纷繁，我们怎样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呢？要抓住投降主义这个要害。“《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它用“反贪官”作幌子，宣扬忠于皇帝的奴才思想，鼓吹向皇帝投降。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念，它是说：在不反皇帝的前提下，可以反一反贪官，而反贪官的目的，又正是为了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我们不能把这个整体观念分割开来，如果认为“只反贪官”尚有可取，“不反皇帝”才是错误，那就不对了。《水浒》极力宣扬这样一种反动观点：皇帝是好的，贪官是坏的。它把同属封建统治集团的皇帝和贪官硬给截然分开，搅乱视线，混淆听闻，把几个贪官推出来作挡箭牌，企图用以模糊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掩盖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皇帝既然是“好”的，当然毋须反对，而应该做他统治之下的“顺民”，从而鼓吹了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反动思想。所以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鼓吹投降，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不但不许打碎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修整和加强这部机器。所谓反贪官，也不过是要给这部机器擦洗擦洗或是更换更换几个零件而已。实际

上封建阶级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能由地主阶级自己通过擦洗和更换零件而得到更新的，只能由革命的阶级用暴力的手段彻底打碎它，才能够推动历史前进。

“天命论”的迷雾

儒家的“天命论”是地主阶级用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反动思想武器。《水浒》的作者把这个反动武器拿在手里狂挥乱舞，编排了许多荒诞情节，制造了重重迷雾。皇帝和宋江，本来只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作者却又给他们添上了一层“天子”与“星主”（和天上的星宿相对应的“贵人”）的关系，从而用“天命论”这种反动迷信思想进一步吹捧皇帝，美化宋江。

《水浒》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就是一段荒诞迷信的情节，但它在全书中的地位却很重要，是一团笼罩全书的“天命论”的迷雾。

宋江刚刚混进梁山泊，就要把他的地主父亲接上山来，以尽“孝道”，于是独自一人，冒险回家，随即遭到郛城县捕头的追捕。他连夜逃跑，在还道村的九天玄女庙里躲藏。就在这座庙里，作者安排了宋江接受九天玄女所赐仙酒、天书的场面。九天玄女传授给他三卷“天书”，对他宣讲了一段“法旨”和四句“天言”，要他“终身佩受，勿忘于心，勿泄于世”。这里，作者故弄玄虚，用儒家“天命论”的封建迷信观念，给《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宋江搞投降活动制造根据。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用所谓“神”来欺骗人、吓唬人，企图以此说明《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是“天意神授”，是“正确”的，是不可

抗拒的。“法旨”和“天言”是宋江“终身佩受”的，它是宋江一生行动的准则，做人的“诀窍”，念念不忘的“座右铭”。

九天玄女的“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四句天言是：“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

这里首先提出了“替天行道”。“天”，指的就是“当朝天子”宋徽宗；“道”，指的就是儒家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也就是孔孟之道，封建统治之道。在《水浒》的作者看来，封建皇帝是“真命天子”，封建统治之道是合理的、长存的；宋徽宗是当朝的“圣明天子”，只因受了贪官、奸臣的蒙蔽，故而其道不行，所以才需要宋江这样的“星主”出来“替天行道”。怎样“替天行道”呢？那就要反一反贪官，帮助皇帝整顿“朝纲”，进一步还要“辅国安民”，替皇帝去镇压农民起义，从而帮助皇帝维护封建政权。所以，“九天玄女”提出“替天行道”，就是给宋江的投降主义规定了一条政治纲领。

“法旨”还提到“全忠仗义”，这是宋江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忠义”是以忠于皇帝为最高原则的封建思想。很明显，这里的“全忠仗义”就是后来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的依据。

“为主”是说明宋江要篡权，要当梁山泊的寨主；“为臣”是说明宋江要投降，要当“大宋皇帝”的臣子。而当寨主是“邪”，当臣子才是“正”，所以又要让他“去邪归正”，投降朝廷。

四句“天言”则规定了七十一回以后的故事内容。“遇宿”和“逢高”是宋江搞投降活动的主要过程。“遇宿”指的是遇到

宿元景。宿元景是封建朝廷里的“招降派”代表人物，与宋江的叛卖投降一拍即合，遇到他，宋江当然是喜上加喜。“逢高”指的是逢到高俅。高俅是封建朝廷里的“镇压派”的代表人物，不吃败仗是不同意招降宋江的，但宋、高同属地主阶级，说到底是一丘之貉，所以宋江逢到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的事。这里，九天玄女果然泄露了“天机”，交代了宋江的阶级属性和他那投降派的本质。至于“两处见奇功”，那是说北征幽州的辽和南征睦州的方腊，是宋江投降以后向封建皇帝效忠的具体行动。

《水浒》的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和“天言”，点出了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规定了全书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所以我们说，第四十二回是笼罩全书的一团“天命论”的迷雾。透过迷雾，抉露真情，九天玄女的“法旨”、“天言”，就是传达了整个地主阶级提供给投降派头子宋江的指导思想和反革命策略，突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贯穿《水浒》全书的投降主义思想。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必然导致投降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本不能代表农民起义的革命要求。“反贪官”的问题也必须从路线上作分析，必须抓住反不反皇帝这个关键。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支配之下，由于不反皇帝，他的所谓“反贪官”，不过是奴才效忠皇帝的行为，其目的是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忠为君王恨贼臣”，《水浒》里的这句诗恰好说明了宋江之流的反贪官的目